

NO.

20X20 = 400

原稿

第
頁

華 人 傳 播 想 像

馮應謙 黃懿慧 編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亞太研究所

華人傳播想像

馮應謙 黃懿慧 編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亞太研究所

2012

香港亞太研究所・研究叢刊第九十二號

華人傳播想像

Imagining Chinese Communication

編者：馮應謙、黃懿慧

出版：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

地址：香港沙田香港中文大學

印刷：卓利製作公司

版次：二零一二年一月第一版

國際書號：ISBN 978-962-441-592-6

© 香港中文大學 2012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華人傳播想像

編者向臺灣政治大學傳播學院講座教授汪琪，以及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李少南致上誠摯謝意。汪琪教授推動與主持「華人傳播研究工作坊」，李少南教授接棒籌辦「華人傳播想像」會議，工作坊與會議中之諸多研究與論文為本書之濫觴，在此謹向汪琪教授與李少南教授致上最誠摯感謝。

序言

馮應謙

華人傳播研究已有超過40多年的歷史，在傳播理論本土化氛圍和成熟的華人傳播理論湧現這兩個大前提下，正是時候反思我們在華人社會發展出來的理論在哪一個方向、範疇和理論層面上與國際學術界對話、融合與論辯。另外，我們是否可以開始思考如何將自己社會累積的文化資產和知識「立足中華、放眼世界」？如果我們最終的目標是要發展出一套可以適用於不同社會和文化的理論，則由我們所面對的現況，到我們最終的目的地（from where we are to where we want to be）的這條路要怎麼走？中西典籍浩瀚，我們又可以從何處著手？

本書的想法和內容源於2008年12月6至7日由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主辦的「華人傳播想像」會議。該次會議的宗旨在於集結來自各地華人學者的心得、想法和研究，希望最後可以凝聚一個華人傳播理論的共同觀念或面向，繼而把這理念帶回各人的研究當中；亦希望由此開端，引發未來更多主題研討會，拓展華人傳播理論的疆界。本書主要由與會者中來自中國內地、香港及臺灣的部份華人專家學者的論文所組成，

專家包括上海交通大學的張國良和胡薇、復旦大學的黃旦、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王怡紅、香港中文大學的李少南、陳韜文、蘇鑰機、羅文輝、黃懿慧、臺灣政治大學的汪琪和劉忠博、淡江大學的趙雅麗，以及此後徵集得來的包括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姜飛和美國羅德島大學的陳國明等學者的文章。本書集眾人之力，能夠出版要感謝各位撰稿人的努力。

甚麼是華人傳播想像？為甚麼需要華人傳播想像？我們的想像又是怎樣的？僅以我個人所接受的西方傳播學教育和對於華人社會傳播問題的有限認識，我想「華人傳播想像」是多方面的，可以有不同的研究路徑和研究視角來回答。作為社會科學分支之一的傳播學，一直以來置身於實證主義（positivism）與反實證主義（anti-positivism），或者經驗主義（empiricism）和闡釋主義（interpretivism）的知識論與方法論的爭論中。比如，從政治經濟學的取徑來研究媒體，學者們會著眼於宏觀層面、社會結構方面的問題；而用文化研究的視角來分析媒體時，關注點往往是微觀的、具體的，並且帶有人文主義色彩和批判精神。研究社會問題就是這樣，不同的立場與派別可以各自發展。早在1980年代初，Gerbner（1983）就在其主編的「領域中的爭鳴」（*Ferment in the field*）特刊中為我們勾畫了傳播學發展的歷史，及當時存在於西方傳播學界中的主要流派與研究取徑，和它們彼此間所處的位置，即彼此的差異遠近與相互爭論和交鋒的核心範圍。儘管當時關於傳播學是否為一門學科（discipline）的爭議不止，但我們必須看到傳播學是基於其他多種學科及理論發展起來的，而且當時的傳播學已經告別了只有美國學者統治的年代，進入到融合歐洲學術界（尤其是英、法、德）觀點和理論的階段，各種研究派別相互交鋒。以McQuail（2010:5）的觀點而言，儘管他們的知識論與理論架構大相逕庭，但爭辯的同時，他們亦取長補短。由此可見，傳播學的知識背景和學科外延十分寬廣深遠，也正是如此，在這個領域中的每一種取徑都試圖對社會問題呈現出多角度的回答。正如Comstock（1983）於Gerbner的「爭鳴」所說，各類理論取

徑的爭鳴，並不在於爭論誰能給出某一問題的最佳答案，而在於就某一有價值問題的理解和回答提供了各種不同的看法。與西方傳播學的研究內容與路徑的多元化相比，華人傳播研究內容雖較豐富，但研究路徑和視角遠不及西方。若華人學者不能充份意識到西方傳播學研究領域與理論根基之多元深廣，不能跨出自己的學術小圈，是無法正確把握甚麼是華人的，甚麼又是與世界共有的。我們需要時時反省，是否真的需要創造自己的理論與詞藻？還是也可以運用西方的視角和路徑？換言之，儘管我相信華人傳播有其獨特之處，但如果我們不孤芳自賞，而是以開明的心態看待和理解西方傳播學的理論與視角，並且努力嘗試將二者進行比較的話，專屬於華人的東西就不可能太多，亦能減少因本質主義所造成的理解偏差。當然，這不是要將華人傳播研究西方化，我亦反對如此。但與此同時，絕對的、排他的中國化的傳播研究也是要不得的。

從本書所收錄的文章來看，華人傳播想像的視角大致可以分為三類，每一類都具有相互爭鳴的兩極：第一類是關於全球化與本土化（globalization-localization）的議題，主要探討全球化語境內本土傳播學學科發展中的問題與機遇，尤其是西方學術界的問題與理論是否適合華人社會，能否解釋本土存在的問題與現象；第二類是去中國化與中國化（desinicization-sinicization）的議題，針對的是研究問題和研究對象的本質討論，一方面關於華人社會特性的實質是否存在，與他國在傳播問題和現象的差異有多大，另一方面也是涉及學術價值與學科貢獻的多寡；第三類則是關於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collectivism-individualism）的議題，學者們試圖從人際關係與社會關係的脈絡來挖掘「個體」、「集體」及「關係」本身與華人傳播之間的相互關係，並以此來進一步思考和討論上述兩個議題。簡括而言，在這三類想像視角的背後相互探討了三大主題，包括：（一）華人傳播理論、研究方法和研究問題在這階段有何特徵和方向，跟西方的主流論述有何異同？（二）就有關領域中，「本土化」或「中國化」的程度如何？

為何在這些領域中需要「本土化」或「中國化」？（三）這個主題怎樣可以容許我們在各自的領域內回歸本身的社會文化，並同時建立與西方對話的空間？值得注意的是，這三類議題對於「華人傳播想像」的問題同等重要，含義各不相同，卻又彼此聯繫、互有重疊，並非完全割裂、彼此排斥。所以我們在思考華人傳播研究的時候，必須意識到這三個看似相似卻又不同的面向。為此，我們可以提出各種見解，互相答辯，互相回應，這是很好的一種方式，問題會一直持續下去，不會停止，並且在矛盾與爭鳴中推動學科的深入與發展。

根據各文的特色與編排的需要，本書共分為四大部份，每一部份均涉及上述三大議題，但側重不同。

第一部份華人傳播研究，主要是回顧和反思華人傳播研究的歷程與其中的問題。學者們就過去30年來華人傳播研究的整體情況從三種不同的角度進行論述，均指出華人傳播研究在理論建構與學術方法規範性上存在不足。黃懿慧從華人傳播研究之研究取向、辯論、共識與前瞻，進行質性回顧與探討。她的關注點聚焦於整理四種研究取向的主要論述與相關批判，即，「文化普同」（culture-general）取向的傳播研究或傳播理論；「文化獨特」（culture-specific）取向的傳播研究或傳播理論；「（東、西）文化比較」取向的傳播研究或傳播理論；與「文化間傳播」取向的傳播研究或傳播理論。然後，她又探討了不同研究取向間的辯論，並得出儘管各種研究取向、定義、知識論與方法論不同，但仍出現三點共識：（一）應以華人（或亞洲）文化為中心關懷，並朝向「非極性」（non-polarizing）理論建構方向努力；（二）不論採用何種文化觀點（普同文化、華人文化中心、中西文化對比或文化互補融合觀點），皆應顧及理論的上層預設、世界觀與科學哲學問題；（三）正視與處理方法論問題，採用開放、流變、創新甚或整合的態度進行研究。張國良和胡薇的文章以實證分析的方法論證近30年以來華人傳播研究的狀況。主要通過內容分析的方法，以1979至2007年傳播學專業期刊論文，尤其是高被引率的論文為視角，

考察其特徵、變化、得失和趨勢。研究顯示，與數量的增長相比，質量的提升遠遠不如人意，即使在高被引率論文中，具有創新性的論文亦不足四分之一。作者指出，除了傳播學在華人社會發展的歷史短、基礎弱等客觀因素之外，從主觀層面看，評價機制的急功近利、專業期刊的良莠並存、研究隊伍的參差不齊、科學方法的訓練不足等，是幾個比較重要的因素。此外，作者亦指出近十年來華人傳播學出現的變化趨勢，包括高被引率的論文數量增多；研究方法日益多元化，取代1997年之前思辯方法一統天下的局面；「新媒體」、「傳媒經濟」、「經典學說」、「學科發展」、「受眾」這五大主題成為學術界關注焦點；學術發展在中國內地存在明顯的性別和區域的差異等。陳韜文的文章從理論探討和現實分析兩方面對華人傳播研究進行回顧與反思。文章前部討論傳播學在華人社會如何處理全球化及本土化張力的問題；後部以中國內地傳播研究的困局及出路為參照，試論推行理論化研究的具體配套條件。作者認為華人社會如何處理全球化及本土化張力問題的關鍵在於華人傳播研究理論化，華人學者不能藉學術本土化的名義而故步自封，失去跟國際對話的介面，自絕於國際學術的發展。故要發展理論，這是華人傳播研究者的主要責任。此外，理論的追尋需要具體的改革行動。聚焦中國內地，儘管近30年發展迅速，但研究質量難與國際學術界對話。要解決現實問題，需盡快進行有效的傳播學教育改革。

第二部份主要討論華人傳播學的本土化與全球化議題。學者們就全球化時代下，華人傳播研究和華人學者如何立足與建構學術身份的問題發表看法。黃旦指出中國內地30年來的「傳播」研究是以「傳播」一語來尋找「傳播」，於是無論是「傳播」研究抑或所謂傳播學的本土化，均成為一種望文生義式的「想像」，成為技術、策略和謀略的歸納。這不僅表現在從中國傳統和文化中，「騎驢找驢」地仔細鑒別挑選古籍中的「傳播」，也表現在「按圖索驥」地把西方的問題作為自己的問題，把西方的理論作為解決中國問題的鑰匙。作者認為

正是這種焦慮和不自信，不僅令華人傳播學找不到自己合適的立足點，又將希望投射於傳播學的本土化。而近幾年的「本土化」研究路線在作者看來既缺乏古今勾連，亦缺少地方與世界的聯繫。因此，作者認為強調地方性知識，就是面對著一個重新的自我定位，要將我們自己置身於「他人中間」。既可以使我們坦然接納外來的理論並化為己用，同時也可以在對比中發現自己的特殊，並從這不同中發展出自己的概念和理論。陳國明認為由於傳播學在華人地區的起步晚於歐美，一度存在發展失衡、缺乏自主性、忽視自身文化與傳統，故學門建立根浮異域，貢獻頗為有限。儘管這些情況的形成有其歷史原因，但他以為中華文化尤其獨特的傳播根基，可以從概念和應用兩個方面入手建立和耕耘中華傳播學。首先，概念上要縱向批判性與創造性地繼承中華文化的核心價值，同時橫向地參照西方的傳播學理論與方法，在彼此互競互合的激盪過程中，建立起在全球化脈絡下具有本土性的中華傳播學。其次，在實踐中要發展出一個整合性的學會組織，然後逐漸建立相關性的其他學會，來規範華人社會的傳播教學與研究發表。最後，作者提出對於學門的翕闢在於求取貫通，適當地保持自我文化認同，同時培養出在全球脈絡裏的彈性與適應能力，才能達到「本土全球化」與「全球本土化」交互流通的目標。

第三部份主要圍繞華人傳播學的研究範式及方法的討論，亦論辯華人傳播學研究的特性與共性問題。李少南認為華人傳播學有其獨特的本體論、研究課題及方法。由於中國有以儒家學說為基礎的獨特體系，社會研究的重點在人怎樣透過自己的內省修德而體現「天道」，實踐和諧社會的境界，倫理關係亦因此成為核心的問題。故華人傳播研究應加入「應然」的問題。在方法上，由於中國傳統思想講求「用」（實踐）的，並不鼓勵「為知識而知識」的研究動機，所以除了可使用實證主義及闡釋學派的方法外，還應加入哲學的邏輯推理方法，並以「實踐之可能性及結果」作判斷理論好壞的基礎。此外，作者亦強調不必排斥西方在實證主義或闡釋主義影響下所關心的課

題及方法，因它們對華人傳播學的課題及方法都有參照作用。姜飛則把視野投向跨文化的比較研究領域。文章從中國學者的視角就美國跨文化傳播研究的歷史發展和中國跨文化傳播研究領域的學術歷程進行比對，解釋兩者的背景起源、學術思想根基、方法及理論建樹等方面的差異，並且試圖進行該學術領域的跨地對話。作者亦試圖通過對比研究，反思中國跨文化傳播研究現存的問題，為本土學者提供可借鑒的他者經驗，尋找研究出路與方向，並就引入美國跨文化傳播理論解決本土現實問題等具體議題進行闡述。同時，作者亦認為該文的意義也在於為他國學者瞭解華人傳播學者對跨文化傳播的解讀與觀點提供了視窗。

第四部份側重於華人傳播研究中的個人、集體性與關係。學者們旨在通過對具體的實證研究就自我與他者、社會之間的關係問題來進行中外的比較，並深入探討其中的異同。汪琪和劉忠博指出，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是跨文化傳播研究常用的一組概念，但以往的相關討論無法釐清集體主義的意涵，該概念的適用性也值得省思，尤其是「甚麼是集體」這個問題。因此，作者從儒家思想的「差等次序」及費孝通的「差序格局」等角度，重新檢視過往有關集體主義文獻中所忽視的「關係」面向，並進一步提出與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並列的關係主義。無畏於陷入文化本質主義的難題，作者強調在華人社會中，關係主義更能解釋自我與他人之間的動態網絡；與此同時，在跨文化研究中處理自我與他人的關係時，個人主義、集體主義和關係主義的一個三元模式，也能夠提供一個更周全、更有解釋力的理論架構。王怡紅提出「借勢傳播」此概念來透視及探討發生在關係交往價值體系中，華人交往行為的動機、行動策略和交往方式，並以此來批判性地分析這種關係交往的定勢，對形成和發展健康的人際關係所產生的各種作用以至負面的影響。「借勢傳播」指：關係交往者通過向關係網絡中借取「勢」的信息資源，以達到使用關係為目的的一種互動方式或變通增效的傳播策略。作者認為這一概念對於認識華人社

會的關係交往取向有重要意義。另外，作者亦提出她對於如何從理論涵義和建立事實解釋的邏輯關係方面論證借勢傳播這一問題的困惑，值得進一步探討。羅文輝、蘇鑰機、張國良的文章則將視角轉向個人主義/集體主義與網絡色情的第三人效果關係。他們指出由於過去探討個人主義/集體主義的研究，大多在西方與東方國家進行比較研究，很少研究嘗試探討同一文化體系，但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彼此並不互斥，可能共存於同一文化體系中，故該研究的創新和貢獻之一，即在血緣文化相同的臺灣、香港、內地進行比較研究，探討個人主義/集體主義對三地民眾第三人效果認知（third-person perception）的影響。其次，是在這三地探討個人主義/集體主義對第三人效果與「支持限制媒體內容」（support for restriction of media content）間關係的影響，從而擴展第三人效果研究的理論意涵。趙雅麗開拓「自我」的主題，認為「自我」這一主題應該在華人傳播研究試圖打造普適性理論的工作中獲得一席之地，因為「自我」是溝通行為的起點，更是各個文化中所共存的「原生概念」。文章首先探討了華人傳播研究可能的想像，接著分析「自我」問題在傳播行為研究中所具有的紐帶角色，不僅作用於社會內部，也作用於東西方文化系統的交叉。另外，作者比較相關領域的學者進行「自我」研究時所涉及的方法論基礎，以及其對華人傳播研究的影響，即探討了「華人的自我認同」和「傳播的自我認同」之間的關係。最後，文章試圖以紮根理論的精神找尋不同意義情景中的自我，並提出一個初探性的研究自我的方法論基礎，即從意義的角度出發，釐清「自我」與「生活世界」兩者間各種多元、多層、多樣的內涵，和針對「自我所涉及的世界觀」進行根本的檢視，分析世界觀的差異究竟如何影響傳播行為的本質，及其所造成的影響層面有何不同。

本書最後的結語部份是黃懿慧的「華人傳播研究前瞻：世界觀、理論預設與研究方法」，亦不乏啓示。文章提出華人傳播研究在世界觀、理論預設與研究方法上所需關注的問題，主要分四點討論：（一）採「文化導向之世界觀」視角，瞭解

東西方世界觀的本質差異，以及此差異對於華人傳播研究之「觀看視角」所產生的影響；（二）認識傳統華人傳播的本質，並探討其與主流西方傳播理論的異同；（三）以具「情境敏感度」的研究態度，呼應開放與流變的研究精神；以及（四）探索在東西文化下，個別變項或構念在本質上的異同。

如果深究「想像」二字的內涵，我想前輩Mills（1959）已然在他的《社會學的想像》（*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一書中給了我們不少啟示。社會學的想像，並非是單純而不切實際的天馬行空，它是利用想像力提出並回答社會學的問題——是一種心智的品質，一種把個人和社會聯繫起來加以抽象思考、邏輯推演的能力。這種品質可以幫助我們釐清個人難題（personal troubles）及公共議題（public issues）之間的關係，超越時間和空間，看清世事，把握社會因果脈絡中的個人歷程。這種想像力也是一種視角轉換的能力，能夠超越日常生活的常規視角，從新的角度挖掘問題和解答問題。Mills強調獲取知識、增進理性的關鍵是要打破陳規，必須將自己從周遭熟悉的環境裏解放出來，並將研究對象置於更廣大的範圍中去思考。試想一下，如果將華人傳播的問題放在全球的情景裏，或者切換角度以一個非華人的視角來看待華人傳播的問題，我們會有怎樣的想像、作怎樣的回答？

綜觀幾十年來的華人傳播想像，可以用「良莠不齊」四字概括。誠如本書中張國良等以專業期刊論文為研究視角，實證分析近30年來華人傳播研究的狀況所顯現出來的事實：論文數量增長，但品質提升遠不如人意；研究隊伍參差不齊、科學方法訓練不足等。撇開民族情節、文化主義，還是學術主體性、話語權不論，我認為目前華人傳播研究存在的主要問題：一是很多研究者只是對現象進行描述，甚至沒有一個明確的研究問題，缺乏社會科學研究的基本素質。二是儘管很多研究是實證研究，討論了具體問題，但是缺乏以小見大、抽象概括的能力，沒能將研究成果提升到理論層面，缺乏與他者對話的意識。三是不少文章脫離實際、沒有實證，空談泛談理論，俗

稱所謂的「掉書袋」；或者用一些模糊的中國概念，只是單方面強調中國特色，卻避而不談與西方的異同，也不進行理論對話，實在算不上嚴格意義的社會科學研究，真正的學術貢獻甚微。所以，從當前的全局來看，華人傳播的「想像力」存在不少非常嚴重的問題，遠未達到Mills所論述的社會科學研究者所應擁有的心智與能力，因此，華人傳播想像之路上的學者，可謂任重而道遠。

除了基於良好的學術修養與扎實的科學研究方法外，我所期盼的華人傳播想像，應是多元的理論思路和多元的研究範式並存，在開放和包容的學術氛圍裏，讓每個人都發揮自己的「社會學想像」。譬如，在當下的中國，我們不能簡單劃分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因兩者已經共存交織，所以研究相關問題的時候，我們即可以通過量化方法探討個人方面的問題，也可以通過如政治經濟學或文化研究等路徑，用質化的方法解釋集體方面的問題，或在有需要的時候將質化和量化研究方法結合，將不同研究思路融合。又比如，在本土化與全球化的問題上，作為華人傳播研究者，我們可以強調本身的社會歷史與文化，關注我們最重要的傳播議題，但不應忽視媒體全球化與文化全球化，包括傳播媒體國際化、教育全球化，以及超越國界的新媒體科技對華人社會的客觀影響。反之，在討論全球化的問題時，也要有批判視角，不僅看到文化帝國主義（cultural imperialism）的存在，也能發現本土的張力。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學術界也強調自身的本土化，但也注重國際視野，譬如Thussu（2009）在《媒體研究國際化》（*Internationalizing media studies*）一書中指出，研究者要避免知識論上的本質主義（epistemological essentialism），首先要從多元化的理論點切入全球化的媒體議題。例如，Thussu認為當下的全球媒體研究不可忽略的是：中國和印度媒體的發展，以及其他亞洲國家對傳統傳播學研究的修正。這種平衡西方和亞洲的理論論述的確是不少歐美傳播學術研究所忽視的，當我翻閱一些重要學術會議如國際傳播學會（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和新聞與大眾傳播教育協會（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 in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的論文集和一些主流的期刊時，以西方觀點為定義的全球化論述仍是主流，不少有關傳播影響的文章結論也並非適用於東方。不過，我在這裏也想提出一極端想法，當然「Chindia」（中印）是一個全球化媒體研究不能忽視的中心，但把「中印」當作為西方主流以外的第二個中心，也犯了同樣的錯誤。在媒體全球化下，除西方和中印外，其他地區如非洲、南美洲和中印以外的亞洲媒體議題也不能被邊緣化。所以，我想說的另外一點是，對於華人傳播研究的學者而言，在強調去西方化（dewesternization）或中國化的同時，我們必須問自己這樣的問題：有多少傳播現象只有中國才有、獨一無二？「中國特色」是否就意味著某些傳播現象或議題在其他地方不存在？我們的研究能在多大程度上為傳播學這一學術領域的知識積累做出貢獻？事實上，我們期待不同角度和觀點的華人傳播想像，我們需要更多具體深入的研究來論證「中華傳播」或「華人傳播」議題的意義與學術價值，樂意看到更多的華人傳播理論。所以，我們要抱著治學的態度，負責任地提煉「中華傳播」或「華人傳播」議題中的概念，更主動積極地與全球範圍內的學術界對話，辯證地處理本土化、國際化與全球化之間的關係，為修正和推進傳播學理論及學科發展而努力。

最後，我想強調的是，本書的內容不只是「想像」，而是致力於從不同的視角，以經驗研究或提出具體而有系統的論證來探討華人傳播研究的發展軌迹。作為一個起點，本書希望能起拋磚引玉的作用，引發未來更多傳播學學者參與華人傳播想像的多元化討論。儘管本書的內容並非無所不包，但我們希望通過它來加深學者們對於華人傳播學日後發展的思考，以及增進東西方傳播學研究的對話與交流，尤其在今天這樣一個環境裏——中國正在崛起，擁有西方教育背景的一大批學者回到中國本土和華人社會。如果不作自我反思，故步自封，中國很可能重蹈昨日覆轍。所以我們需要不斷地與西方世界進行對話。這

對於中國和華人社會，乃至全球範圍內的傳播學發展都將是有益的。

參考書目

- Comstock, G. (1983). The legacy of the past.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3(3), 42-50.
- Gerbner, G. (Ed.) (1983). *Ferment in the field* (special issu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3(3), 4-362.
- McQuail, D. (2010). *McQuail's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 Los Angeles, CA: Sage.
- Mills, C. W. (1959).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Thussu, D. K. (Ed.) (2009). *Internationalizing media studies*. New York: Routledge.